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诗经楚辞选

周满江 桑林佳 吴全兰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马 爽
责任编辑：黄道京 李玲 高子如
封面设计：石 洋
版式设计：叶凤岩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诗经楚辞选
- 先秦文选
- 汉魏六朝诗选
- 汉魏六朝文选
- 汉魏六朝辞赋选
- 汉魏六朝小说选
- 唐宋诗选
- 唐宋词选
- 唐宋文选
- 唐宋小说选
- 元明清诗词选
- 元明清文选
- 元明清曲选（上、下）
-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上、下）
- 三国演义（上、下）
- 水浒全传（上、下）
- 西游记（上、下）
- 儒林外史
- 红楼梦（上、下）
- 现代诗选
- 现代散文小品选
-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 现代戏剧电影文学选
- 现代女性文学选
- 中国文学史（1~5册）

ISBN 7-80680-142-1



9 787806 801420 >



ISBN 7-80680-142-1/I · 076

定价：22.00 元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诗 经 楚 辞 选

周满江 桑林佳 吴全兰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经楚辞选 / 周满江等选注.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诗... II. 周... III. ①诗经—文学评论②诗经—注释③楚辞—文学评论④楚辞—注释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7167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诗经楚辞选

周满江 桑林佳 吴全兰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16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80-142-1 / I·076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岿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扬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人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接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面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盈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一、论《诗经》

(一)《诗经》编纂及流传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王国,这个名不虚传的称号的得来,是由于从西周以来举国上下都很重视诗歌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在朝廷和诸侯国之间,在人们的交往中,在君臣之间的政事活动中,大家都喜欢且善于以诗歌作载体进行思想交流,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赋诗言志”。这是诗的最初的最基本的实用价值,它来自民间的对歌。山村人民以歌唱传递爱情、友谊,也表示对政事的感受。上层社会最初采用了他们这种对歌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进,周统治者感到了危机的临近,想到听取民意的必要,同时,娱乐和赋诗也要不断补充新歌。于是,一方面规定诸侯和官吏的献诗制度,一方面又设置了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说:这种采诗官称作“行人”,他们敲着木铎巡于路上,采集民间歌谣,然后献给乐官太师,这种刚采来还没有配乐器的歌,称作“徒歌”。大师对这些歌加以整理,配上音乐,演唱给天子听,这种配乐的歌才叫“乐歌”。大约到了春秋时代,乐师和诸侯、大臣所献的诗越来越多。不管是“赋诗言志”,还是乐师教学生演唱等场合,都嫌过多而难于掌握。时势和实用都要求能有个精选的本子。于是一位编选诗乐的人便应运而生了。这个人的具体时代、姓名目前都无从考证。古代曾

传说编者是孔子，如《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段话说明《诗经》的诞生，是孔夫子“删诗”的结果。编著权归于孔圣人，自然使《诗经》这部书身价百倍。它在孔子时代仅称《诗》或《诗三百》，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它也升上了“经”的地位。到宋朝以后，疑经之风吹了起来，朱熹、叶适等人对“删诗”说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他们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相信。此后追随者颇众，至今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诗经》虽不一定是孔子所编，但毕竟是经过整理并精心组织而成的诗集。因为，从各地采来或献来的歌，必定在形式、字句上有较多差别，特别在声韵上，由于方言的影响，肯定差别更大。而现在的《诗经》在句式、虚词、声韵上如此相近，足以证明有一个内行的精通诗歌的人花过较大的工夫。《诗》305篇，全是配了乐的“乐歌”，这证明一定是管音乐的太师所为。我们再看看太师的职责，就更可证明太师是《诗经》编者的事实。《周礼·春官》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段文字说明太师是负责教学的老师，为了教学的需要，精选三百多篇诗，编成课本，是理所当然的。当时还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学子都是贵族子弟，他们学会这三百多篇诗之后，在继承父业参政时也足够应付“赋诗”的场合了。同时，由于宴会“赋诗”的方式是官吏们或宾主们点曲子由乐工演唱，故乐工也要有个比较固定的底本，演练得烂熟，才能随点随唱。因此，也可以说，《诗》既是太师教学的课本，也是乐队的一个节目单和唱歌底本。

太师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是为实际应用，但是不是随便地顺手捡来，杂凑成册呢？从书的内容看，这位编者太师确实是一位有政治远见、有深厚艺术功底的家。对此，古人也早已看到，汉朝人有句名言：“王道缺而诗作。”（《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说明《诗

经》的编纂,除了上述原因外,这种讽谏君主,讥刺现实黑暗的目的也是存在的。“王道缺”的内涵,就是周王名存实亡,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陷于苦难的深渊。太师这种官职,虽在王官之中,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低,与朝廷中的巫史之类一样,他们可以接触帝王,但被倡优畜之。对下可以接触下层官吏和百姓,熟知他们的苦难。他们编这本诗集时,广泛采集各种内容的作品,又特别突出政治讽刺诗和民间诗歌,其中必定寄寓着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情思,他们的反压迫的正义感,同情人民的仁爱之心,爱国爱家的热情,无不透过编选取舍的信息让我们昭然感知。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过了许多年,到孔子执教的时代,《诗》的价值才被充分发掘出来。孔子有一段名言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段话从政治礼教、文学、博物等方面说明了诗的作用,不仅为整个封建社会的“诗教”定了调子,而且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理论与艺术特色奠定了基础。孔夫子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经》专家。孔子对《诗经》的精通,不只在诗义方面,他对诗乐也有很深的修养。每首诗的曲调准确与否,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本来在他所处的时代,诗乐已逐渐失去魅力,“赋诗言志”的事已不盛行,代之而起的是新的音乐——郑、卫之音。诗乐这种古老的曲调让年轻人听了打瞌睡。而孔子独嗜古乐,对郑、卫之音极力反对,认为这些音乐乱了诗乐,于是晚年,以六十九岁的高龄,不辞辛苦整理诗乐,把走调的乐曲予以纠正,此举在历史上称为“正乐”。此事的是与非可不评说,但在《诗经》的流传上是有大功的,因为他的“正乐”之举使弟子们对《诗》的传习更郑重严肃了,门人的一代代认真地传习,才使《诗》得以更广泛地流传,经典化的过程为之加速了。经过子思、子夏、孟子的传习,到战国的荀子时代,《诗》就列为

儒家的五经之一，称《经》了。

先秦书籍，在秦始皇“焚书”和楚汉争战以后，散失很多，《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才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文帝时代就先后出现了三位传授《诗经》的老先生：鲁人申培，他传授的诗，称《鲁诗》，燕人韩婴，他传授的《诗》，称《韩诗》；齐人轅固（或称轅固生。生是敬称）传授的诗，称《齐诗》。总称“三家诗”。他们讽诵的诗及诗句讲解，都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下来，故以后人们又称这三家的《诗经》为今文《诗经》。此外，还有一家《毛诗》，其传授人是毛亨，他讲解《诗经》的著作称《诂训传》。不过他没有“三家诗”学者那种幸运，在西汉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承认，只能在河间献王等诸侯王国中传授。毛亨去世后，弟子毛萇（人称小毛公）承其衣钵，继续在诸侯国内传其学说。直到西汉末年，《毛诗》才渐渐得到出头的时机，一度被汉平帝承认，并立于学官，设立博士。但不久又被东汉光武帝逐出官学，只能在民间传习。尽管如此，在东汉它还是日益受人重视。尤其在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故（诂）训传》作《笺》以后，《毛诗》的声望更为鼎盛，学《毛诗》者日益众多。而“三家诗”虽然一直高居官学，占着博士的宝座，研习者却日益减少。东汉亡国后，“三家诗”也随之衰落，而终于亡佚。《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勉强维持到唐，至宋朝已只能看到《韩诗外传》了。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二）《诗经》的体制

《诗经》从体制上说，分为风、雅、颂三种。编者就是按此三体分类编排，使全书分成风、雅、颂三部分。

“风”在这里是乐歌曲调的意思。由于全国各地的曲调都有地方特色，故又称“国风”。“国”是方域、地区的意思。“国风”就是地方的土调。编者按诗乐的地方特色分编为十五国风。其地东至山

东,西至陕西、甘肃之间,南至江汉流域,北到河北、山西一带,地域是相当广阔的。

“雅”是正的意思,指西周京畿内的乐歌。京畿是全国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其方言为“雅言”,其乐歌为“雅乐”、“正乐”,这是当时尊王观念的具体表现。京畿是上层贵族聚居之地,故《雅》中多贵族诗人的作品,内容也以反映贵族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为多。《雅》又分为《大雅》、《小雅》两种。《大雅》是时代较早且以歌颂为主的诗。其中史诗、赞颂诗计二十篇,政治讽刺诗八篇。其写作时代约为西周初年至周幽王时代。《小雅》中有三十一首是赞颂诗和写宴饮生活的诗;另一半是写征戍之劳的诗和士大夫的怨刺诗,在风格上与《国风》比较接近。其中最早的诗不出宣王时代,而最晚的诗,则在东周之初。

至于“颂”,《毛诗序》的解释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就是说,颂是赞美祖宗功德,并向神灵报告政教业绩的赞美诗。这类诗中有一部分是舞诗,如《周颂》的《维清》、《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等。其余多数都是祭祀、朝会等礼仪中用的乐歌。《颂》中有《商颂》五篇,是商朝末年祭祀汤的乐歌。一说,认为是春秋时代宋国的祭祖诗。自西汉以至于今,此二说并存,未有定论。《周颂》三十一篇,产生的时代,大体上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内容都是祭祀上帝及祖宗的,同时,也有歌颂周王的德行功业的。《鲁颂》四篇,是朝会宴饮及歌颂功德的仪礼用诗。在诸国中唯鲁有颂诗,因鲁君是周公旦的后裔(周公长子伯禽始封于鲁),一向享受特殊礼遇,故其诗得列于《颂》。这部分诗是《颂》中最晚的作品。现代学者大都认为是鲁僖公时代的诗人奚斯所作。奚斯,字子鱼、为鲁大夫。

(三)《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虽说只有三百零五篇,但所包括的时代长、地域广;所反映的生活面广,思想内容丰富;对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的形象、思想感情都有如实的描写和表现。有歌颂、有讽刺;有爱也有恨,有乐也有悲;有积极奋发的爱国英雄,也有消极颓废的懦夫;有创业的英雄,也有亡国丧家的昏君乱臣,充分说明《诗经》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思想内容的深广性。

1. 周民族的史诗

与国外相比,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史诗很少,《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可以称史诗中的优秀作品。所谓史诗,实际上也是叙事诗中的一种,它是在古歌谣基础上经集体的口头传诵而成篇。在内容上反映原始时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在艺术手法上可写实可虚构,塑造著名人物的形象,充满着人类童年的幻想和神奇色彩。《生民》等五篇诗除了篇幅较《伊里亚特》等外国史诗短小、并用于祭坛歌颂祖先外,其余特征基本符合史诗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各民族的艺术作品都不能是一个模式,而应有自己特色。

《生民》叙述周始祖后稷创业的历史。后稷是目前所知道的周族的最高祖,他母亲姜嫄是姜部族有邠氏的女儿。诗一开始就敷演神话描写后稷神奇的诞生史。神奇的是,后稷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在灵禽异兽的护佑中,冲破胞衣成长为人时,就向族人显示了他的不同于众,表现出上帝之子的特质。但周族与商朝人不同,他们特别强调以德配天的观念。后稷在出生不久,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独立成长,他不求乞于上帝,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垦土种田,不仅年年丰收,而且品种越来越齐全。事业的成功,也给他带来家的幸福,在有邠建立家室,子孙繁荣,受到族人的拥戴,成为氏族领

袖。后稷的德业在于他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自然。因此他取得了以德配天的领袖地位。他的事迹和精神,虽以神话形式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是周族人民战天斗地历史和力量的形象再现。此后,大约过了三代,周族出现了第二个大人物公刘,他为了避开戎狄的侵犯,由邠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或邠县)。《公刘》这首诗描述了他统率周人团结一致长途奔波,在豳开拓田地、营建都邑的史迹。诗中刻画了一位受族人拥戴的果敢刚毅、善于组织谋划的英明君主形象。诗中不用神话传说,全是实录般的真实描写,表现了一个北方的农业民族的朴实与勤劳的素质。《绵》所写的是古公亶父始迁岐周,开创王业的业绩。他是周文王的祖父,又称太王。周族从后稷创业,至此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都在艰苦地为生存而奋斗,到太王时代又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找到“萁茶如饴”的肥美土地,生产和生活都大为提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国家,并正式称自己为“周”。《皇矣》写周文王在先祖业绩的基础上,发展武力,讨伐崇族,保障了自己的安全,而且为灭商作好了准备。诗中对战场的描写非常精彩,刻画了勇敢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战士形象,表现了周人保卫自身生存的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大明》颂扬了文王和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其中有牧野战场的描写,威武雄壮,表现了诗人的高超艺术才能。从《生民》到《大明》五篇诗,连续续之,可以看到一部周人的创业史。虽然所写的线条较粗,没有长篇细致敷演其情节,但对周人从发祥到立国灭殷,统一天下的历史作了完整的勾画。尤其是对周人几位功勋卓著的君主形象的塑造,对群体形象的描写,更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称为周族英雄史诗,当是无愧于诗坛的。

此外,还有《商颂》的《长发》、《玄鸟》、《殷武》,《大雅》的《江汉》、《常武》等,都或长或短地歌咏了一段历史故事或战争故事,很值得一读。

2. 政治讽刺诗

在《大雅》、《小雅》与《国风》中保存了不少的勇于讽刺朝廷黑暗、社会不公及各种丑行的怨刺诗。这类诗被儒家《诗经》学者称为“变风”、“变雅”，如《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是说，在周朝衰败、政治黑暗的时代，出现了怨刺诗。这个乱世，具体地说是指西周末的周厉王、周幽王和春秋时代。从诗的内容看，可分为贵族的政治讽刺诗和民间的怨刺诗两类。

在政治讽刺诗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这些诗常从天灾入手，揭示出天灾出于人祸的本质问题，大胆地指斥昏君和乱相的为害。揭露社会矛盾、朝政黑暗，毫不留情，辛辣大胆。但诗人的心怀却是忠于朝廷，热爱君王，为国家的忧患而痛心，为千古以下的诗人树立了忠君忧国的榜样。

这部分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人很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婉转讽喻，其后的香草美人的比兴艺术的传统，在这些诗中已初步成型。诗人还善于剖析人物心理，对朝中奸佞的罪恶行径及阴暗心理形容得维妙维肖。在章法上创造性地写出了长篇巨制，表现出当时诗人的艺术功力之高。

民间的怨刺诗，多收在《国风》和《小雅》中。这类诗的歌咏者多出自民间，直接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怨愤、讽刺比前者更强烈更尖刻，没有前者那种欲效忠君主而不得的哀伤，所以批判精神和斗争性都更为直率，真正地表现出人民自己的心声和理想。如《魏风》的《伐檀》、《硕鼠》，对“尸位素餐”、在其位不尽其力的官吏，对如大鼠一样吞食人民粮食的不劳而获者，作了辛辣的讥讽，尤其是采用大鼠作比喻形象，把不劳而获者那种令人讨厌的贼头贼脑的样子极其逼真地勾画了出来，表现了民歌的所长。《邶风·新台》、《邶风·墙有茨》、《邶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